

艾滋病人 问君能有几多愁

消息突然而至

福燕说话和缓淡定,透着一种对谁都亲切的劲儿。17年前,她被调进专门收治艾滋病病人的病房。那时候领导说,不用几年就能轮岗离开。可是,这么多年过去,福燕一直稳稳地待在这里,因为“感染者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

福燕不怕对方对艾滋病有恐惧,只要感染者能把自己怕什么说出来,慢慢来,一个个的问题总能解决。

“有的小伙子一听说阳性,就说‘怎么办,我还要结婚呢’。我再细问他‘准备下个月结婚还是明年结婚’,他说‘还没有女朋友呢’。那这担心的都是很远的事情,我们只说迫在眉睫的事儿:从现在开始吃药,让医生帮你控制住了病情,以后还是能找对象的。”

事实上,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艾滋病已经是一种可通过药物控制的慢性病,感染 HIV 并不一定致命。感染者甚至可以通过医学手段干预,生育健康的后代。

不过,与邓仪一样,大多数人在听到感染的消息之后,首先想到了死亡。“所有生的勇气在那一刹那全部消亡,死的气息压得我无法呼吸。”

邓仪后来看见同样的感染者气色甚好,陪着发病的人住院,督促其他人来医院拿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是跟来复查的人聊聊最近的指数,他才放下心来:“医生护士跟你说再多话,都不及一个同样感染了 HIV 的志愿者走过来告诉你:虽然感染了这个病,现在我还是好好地生活着,我还是可以工作,还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苦果独自吞下

2009 年发现被感染的费杰,一直没把患病的消息告诉父母妻儿,“他们恐慌也没啥用,我一个人能承受这些。”

如果不考虑血液中几乎已经很难检测出来的那些病毒的话,费杰的生活可以说相当不错。这两年,有着古铜肤色的他迷上了户外运动,隔三岔五就跟一票有相同爱好的朋友活动。大家相处得就跟兄弟姐妹似的,碰上有队员体力不支,互相都会去拉上一把。

朋友们知道他业余在当义工。有一回,他还开玩笑似地问过他们:“要是我把感染者带来一起聚会,你们敢跟他握手不?”

据费杰这么多年的了解,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感染者会把得病的消息告诉亲友。如果得病的消息被朋友们得知,他们多半会吓得从此不再与感染者联系。“过去的感情什么的,一下就一笔勾销。”有人还会告诉整个朋友圈,于是所有的朋友都迅速从生活里消失了。

他也在病区里见过无法接受儿子患病的母亲。病患是个大企业的高管,已经病得生活不能自理了,母亲在厕所里帮他清洗,特别气恼地接上一盆盆凉水往儿子身上泼,一边还恨恨地说:“你还知道羞耻啊?!怎么现在倒要



►福燕在咨询

起脸来了?!”

“那个人很有能力,挣很多钱,完全不用愁治疗费用的问题,但他后来因为并不严重的脑膜炎,就去世了。”费杰想起来就叹息,“我总想,要是家人支持他,他不会那么快走的。他最后大概对人世也没多少留恋了。”

疑问难以求解

经商的方礼得病前,每次遇到献血车,都会去无偿献血。但因为这个病,这些“好人”能做的事儿,好像从此与他无关了。在他人可能投来的异样眼光面前,他得把自己保护起来。

他愤怒于“舆论在疾病上添加的道德色彩”:就连宣传关爱艾滋病病人的明星,都会在活动中说“我是不会得这个病的,因为我的生活很简单”——难道得了这个病的人,就得被认定是生活复杂的?

“如果是得了感冒,别人会不会问你,你这是冲进雨里扶老奶奶过马路得的感冒,还是大雨里偷别人东西得了感冒?这是道德的感冒,还是不道德的感冒呀?”

就在方礼发表这番意见的时候,

福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前来复查的感染者秀娟。

秀娟从不知自己的丈夫是艾滋病患者。等他被送到感染科来的时候,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

还没从上一个打击中缓过来,她又被告知,自己免疫力也低得快到发病的临界值了。

于是立刻开始吃药。她边吃药边流泪:“他能在哪里得这个病?我俩当初是一块儿去广东打工的——要不是夫妻感情真的好,也不会跟着他去打工呀。”

等知道是艾滋病,丈夫已经回答不了她的疑问了。因为严重的药物副作用,秀娟还曾在陪床时晕倒在丈夫的病床前。可是,恨他吗?“他都已经病成那样咧,家里还有婆婆和儿子要照顾,恨都没有力气。日子总还得过下去吧。”

生活自己争取

费杰是在参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聚会的时候第一次尝试为新感染者提供咨询的。他记得,当时是福燕给他指了指旁边的小伙子:“这是刚刚来

我们这儿的新朋友,要不你们俩聊聊?”

他俩从会上聊到会后,散场了还一块儿走了“六七站公交”那么长的路。对方从垂头丧气一路被他说得昂首阔步地回家了。两人告别后,费杰觉得“特有成就感”。

志愿者们把为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这个过程形容为“把一个气球里的气慢慢地放掉”。费杰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重要。

志愿者阿强比较口拙,他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幅画,咋一看,是只猥琐的癞蛤蟆,但是转一个角度,就是一匹骏马。他有时会用这种方式劝慰哭个不停的新朋友:换个角度看问题,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自己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看了许多感染者的遭遇之后,费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前两天讲座上医生的话说得是真好:我们无法背着你走过沙漠,但会一直扶着你,看你走下去。”

支持不是依赖

方礼特别佩服福燕护士长。他记得在一场分享会上,一个感染者很激动地站起来说:“福姐,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您对我的帮助,简直就是再造之恩啊!”

“要按着狗血电视剧里的情节,接下来两人就该抱头痛哭了。可是不,福姐她就淡定地说:‘我不能做你的妈妈,谁也不能替代你的母亲’。”方礼相信,这才是福燕的可贵之处:用专业的方式对病人进行干预和情感支持,但是,并不鼓励他们依赖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福燕有时候会想,也许感染者更懂得生活。她记得有一个中年男子,获知感染的信息后,回家看望母亲,安安心心地陪了她大半天。他跟着母亲去菜市场买菜,还帮她清洗冰箱。不明就里的母亲感动得几乎要哭了:“我这儿子是怎么了?”

“其实这都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小事儿啊,我从前都在做什么呢?!”这个男子使劲儿地问自己,他这才发现,过去自己白瞎了很多与父母相处的机会。

但作为一个感染者,邓仪不大能被这种说法感动:“如果还在感慨这些,就说明这个感染者还是没真正走出来。每一个感染者,不管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两年,他们总会接受,想通。当他们真正放下,走出医院的时候,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模样。”

无论如何,他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艾滋病完全改变。他成了一个专职的艾滋病义工。

去年,他参加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防艾滋病民间组织的座谈。握手时,他道出了自己的感染者身份。李克强笑着说:“你气色这么好,真不错。”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邓仪、费杰、方礼、秀娟、阿强系化名)

黄昉范

【枕边心事】

科学谈性更性福

我毕业后到普陀区中心医院工作,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很欣赏“两性私语”版,因为这个版非常专业、非常严肃,什么该谈论什么不该涉及,分寸把握得非常到位。因为陈旧、保守的性观念及不负责任的宣传,夫妻性冷淡、性病、计划外怀孕等问题不减反增,直接影响到和谐、幸福的生活,这更显出“两性私语”版的可贵。

“两性私语”版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个性教育专版,坚持 23 年,弘扬性文明,普及性科学,促进性和谐。最近我们连续收到读者朋友的赞许,这些赞许必将会转化为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

第一次约会,他就问我:“你以前有过几个男朋友?”我知道他其实更想问“你以前有没有过性经验?”这种男人,他们有点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有点独占的欲望,没准还有点失落和嫉妒。他的问题充满了潜台词,我如何回答是好?

你可以告诉他:“书店里,有意思的好书都会被翻过,但我不是那种被翻破的书。”你的回答到此为止,不必多说细节。如果他别有处女情结,趁着你们不熟,赶紧放他去找那本还没开封的书吧。

爱爱前,他最喜欢问:“我做什么,你感觉才更好?”我相信他在这方面还是有自信的,只是他更喜欢尊重我的意见,并且从中获得幻想,更放心大胆地爱爱,虽然这样的提问有时候仅仅流于表面。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涉及他的能力问题,一来他不好改变,二来估计他这方面的自尊很脆弱。你只需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如果你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告诉他“听你的”,一样让他马力全开。

我上大学以后,嘴角边长出了黑黑的胡须,皮肤粗糙,声音变粗,月经不调,甚至例假有 8 个月都没有来。天哪,我不会变成一个男人吧?

建议你检查血睾酮水平,如果患有高雄激素血症,需要积极治疗。国内有报道称,卵巢畸胎瘤会导致高雄激素血症,一旦切除,患者便可以甩掉“假小子”的包袱。

自从我生完孩子,他好像就变了,变得不喜欢爱爱。前几天,看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走过去,刚挨着他,谁知他竟冲我喊“滚”,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掉进了冰窟窿,感觉我是给他在守活寡。这种事情又不能对外人说,幸好有“两性私语”版可以倾诉。不知道给他服用“伟哥”是否能改变性欲减退的问题。

“伟哥”只是在人出现性欲冲动时帮助恢复正常的勃起功能,不能激发性欲,所以解决你丈夫的问题还是需找相关医生。